

七日談

（北京篇）

民間常有「人過留名，雁過留聲」的說法，意在告誡世人須以良好的人品與修為，給自己留下一個好的名聲與口碑。

「留名」之名並非名氣大小，而是名聲與口碑之好壞，二者完全不是一個同等概念。通常，那些地位較高、財富較多、職業顯赫、社交面廣的人，名氣自然比普通人要大，但名聲與口碑卻與此無關。名聲作為一個倫理學詞彙，它是人品好壞的標識，是人們依據公共規範對行為個體品行與操守作出的道德評價。

人品不是社交場合得體的談吐，不是簡歷上耀眼的說詞，不是金錢、地位和職業的附屬物，也不是精心維護的表面人設，而是剝掉所有社會角色之後，那個自我人格的本真；屬於個體在無人注視時如何對待自己、在利益衝突時怎樣抉擇，在誘惑面前能否守住底線的那個硬核。一個人的才華可能被遺忘，財富會轉瞬易手，權力也終將交卸，尤其在人生接近終點時，畢生所有的追逐幾乎歸零，唯一能跟隨自己走到生命最後的只有人格。當外在的一切終成過眼雲煙，人的品格才是唯一能將自我與「非我」區分開來的東西，它不是虛榮給你的膚淺答案，而是你過往言行舉止日積月累的社會風評，是在無人喝彩的角落裏，無數個獨處的日夜慎獨、慎微所達成的終極定論。

惟可惜，在商品拜物教猖獗、信息碎片化盛行的當下，儘管技術和交換拉近了時空距離，社交軟件上好友列表越來越長，但人的心靈距離卻越來越遠，可以真心傾訴的人越來越少。一個網紅可憑藉人設獲得千萬粉絲的擁戴，一個富豪可以靠捐款洗白劣跡，人格似乎也交給公關公司打理，依託社交媒體表演，這就讓品格修為漸次淡出公眾的視野。

技術與交換本無過，但卻放大了人性中最脆弱的一部分。那些自我價值感飄忽不定的人，必然沒有底線恪守。他們做人無誠信、辦事沒規矩，對外高唱包容、善良、利他的高調，苛求他人大度付出；對內則奉行個人至上的生存法則，凡事只計較一己的利弊得失。與人相交，有利則親近討好，無利則冷漠疏離；享受他人善意時心安理得，付出分毫便耿耿於懷，精緻的利己主義暢行一時。那些內心無法接納真實自我的人，當然樂於自戀式表演。他們面上裝得道貌岸然，嘴上說得天花亂墜，朋友圈進行虛偽的互動，所有的精心謀劃無不在刻意塑造自我的「優秀人設」，而實質上卻表裏不一、名不副實。而那些無法為自己的情緒和行為負責的人，必會偏執地四處碰瓷。他們沉醉於信息的繭房，只相信那些有利於自己的算法推送。把最光鮮的外表留給了虛幻，最壞的脾氣甩給了家人和同事。自我

做人的品格

雲 德

感覺良好的偏執，經常讓自己栽在言行沒分寸的失誤裏，敗在舉止沒尺度的漏洞中。最終會透支人情、消耗信任，短期雖能博取些許利益，長期卻徹底瓦解個人聲譽，斬斷所有真誠的人際聯結。

這些被縱容且放大了的人格缺陷，任其發展，小則害己、中則傷群、大則誤國。最典型的莫過於某超級大國總統，上任伊始即以商人之道治國，向全世界發起關稅戰，在遭最高法院否決後又尋求以強迫勞動為名對外展開新一輪關稅攻勢；更可笑的是剛以不打仗之名索要諾貝爾和平獎，不久則無端下令入侵委內瑞拉並拘押其合法總統，順利得手後欲罷不能，轉天如法炮製再打伊朗，沒想到碰上個硬釘子，結果手足無措，一會要和談，一會又要對霍爾木茲海峽收費，一會又不惜冒戰爭罪風險威脅轟炸人家的民用設施，尤其在侵略藉口不攻自破的當口，自己公開承認已從委內瑞拉戰爭中大量獲利，並預期伊朗也將如此。這一非法戰爭，被聯合國秘書長及多國領導人視為「構成了危險的先例」，它不僅惡化了地區局勢，破壞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也對該國的世界影響力帶來巨大衝擊。

從這裏可以看出，人格的墮落有時不單是個人悲劇，也會像毒素一樣沿着肌理蔓延，最終瓦解社會共同體根基。阿倫特曾以「平庸之惡」深刻

揭示出：納粹德國的災難雖係少數惡魔罪孽所致，卻也由無數放棄獨立人格判斷的「正常人」協同完成。

所以，越是在社會激盪、價值混亂的時刻，越是需要培育健全的人格。因為情緒穩定、心地善良、共情包容、誠實守信、擁有獨立判斷、能妥善處理矛盾、敢於擔當責任的人群，才是族群和平共處、社會健康穩定的基石。這就要求人們，首先當以真實鍛造自己的人格底色。葆有清晰的自我認知，尋求內在的自洽與外在的和諧，既不必自卑討好、也不用傲慢自大，真心以對、相互尊重才是人際彼此釋放的最大善意。其次當以共情來培育社交的土壤。學會換位思考，理解他人感受、傾聽他人想法，



▲八月四日，河南鄭州，驚鳥立於金水河水域淺灘，時而低頭覓食，時而靜立水中。

中新社

又見馮唐



如是我見
楊不秋

在今年的香港書展，又見到了馮唐。這是我第三年在香港書展聽他的講座。一開場，他一如既往地把姿態放低，謙卑地自嘲講話結結巴巴，十分感謝大家在寶貴的周末時間專程前來聽他嘮叨並且深鞠躬。然後他依舊侃侃而談，無論思路還是口才，在我看來均屬上乘。

說起他那本講解《孫子兵法》的新書，馮唐老師表示，以少勝多是《孫子兵法》中的一種高級戰術，而更高級的戰術是不戰而勝。在職場中，不打仗，不交惡，避免發生衝突而實現目標，才是職場「牛馬」的最優選項。主持人問：如果在工作中受了窩囊氣，那能不能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挺身而出，要不要打？

他給出的答案依然是：不打。並提出了三點建議：一、審題清晰。不要怕麻煩，再次確認雙方對問題的理解。職場中的大部分不同觀點都源於無效溝通以及雙方對信息理解的差異，而非不可調和的矛盾。二、選擇風氣清明、積極健康的工作環境。如果工作環境本身有問題，那麼最有效的解決方式是遠離，而不是通過開戰去意圖改變環

境。三、就事論事，當面溝通，求同存異，以非對抗的方式明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條件和底線，立下規矩，互相尊重不越界。

馮唐說，如果可以，他會選擇在職場永不開戰。開戰對立除了宣洩情緒，顯露出自己的修為不夠，對解決問題沒有任何幫助。每個成年人的觀點和行事風格，背後都有其經年形成的理由，很難僅僅因為受到另一個人的情緒爆發和綁架就突然改變。解決問題需要打破僵局，不能依靠開戰和情緒升級。

這席話令我感觸頗深。在職場多年，總感覺自己一直都在升級打怪。現在想來，這根本就是帶着「對抗」的情緒在工作。幻想着自己可以通過深思熟慮的說教改變對方的心意，讓對方一步步朝我靠近而取得「求同」的勝利。現實也許曾有僥倖偶得，卻更常四處碰壁，也因此經常感到身心俱疲的職場挫敗和不如意。現在看來，錯在起點的心態和目標，任由情緒主導而沒能抓住解決問題的要害。

主持人後來又提問：女性在職場利用《孫子兵法》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馮唐說，女性最大的優勢就是常常可以「不戰而勝」；最大的劣勢是太過於感性，不能做到「事大於人」。

又見馮唐，引發一些有關職場的自我反思，受益良多。



自由談
陳 安

筆者第二部隨筆集《守望知識之獅》最近由花城出版社推出，其上架建議為「文學散文」。

一見新書，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感謝《大公報》這片美好園地——除有幾篇原刊於《南方周末》和紐約《僑報》，此書其餘七十餘篇文章均源自「大公園」。早在二〇〇二年初，我便開始給「大公園」投稿，至今已將近二十五年。承蒙歷屆編輯的雅量提攜，不時有長長短短的文稿出現在這個園地上，我就覺得自己撒下的一粒粒種子任在責編辛勤澆水之餘都出了苗，心頭便有欣慰之感，現在一棵棵苗匯成一片小樹林，更有一種愉悅之情。

這本新書分為「認識美國」、「漫遊世界」和「思念故土」三個專輯，也即從三個方面表述我多年來的海外生活以及思想感情上的種種感受。

認識美國，可從我和寵犬艾維的故事談起，再談到美國的多位文學名家及各種文化現象，連曾有幾年居住在紐約的胡適、老舍也有助於我了解美國。漫遊世界，既寫雨果的根西島故居，也寫梵高的阿爾勒；既描述伊斯坦布爾的色彩，也描述俄羅斯的午夜紅霞。思念故土，既有對啟吾東疆之故鄉的懷念，有對我母親和小學老師的感恩，也有對我國多位文化精英的敬羨。

為此書選稿時，我確定以知識性和可讀性為標準。書名取為《守望知識之

副刊園地讚

獅》，也即出於對知識的格外尊重。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大樓前台階兩側置有一對巨型雄獅石雕，其名為「堅韌」和「剛毅」，它們守望着知識，守望着世界文明的寶庫、人類文化的精品，並歡迎讀者入內親身作一感受：讀書破萬卷，掌握豐富知識、深湛學問，你會像獅子一樣強大無比，充滿力量。我見紐約不少銀行大樓前面也置有石獅，它們顯然負有守護財富的重任，但讀者們給「堅韌」和「剛毅」頭部敬獻的花環、眼鏡和畢業生方帽，銀行前的獅子是得不到的，其頭頂總是光禿禿空無一物。

我早在二〇〇五年出版的第一本隨筆集《尋找貓頭鷹》，其實也是自己報刊文字的結集，尤其是副刊文稿，有登在「大公園」上的，還有登在《美洲華僑日報》「海洋」、《中報》「東西風」和《文匯報》「筆會」上的。我因而特別感慨，曾為此寫道：「在海外，我們也完全可以堅持用中文寫作。可喜的是，在紐約，在我國香港，華文報紙都十分重視副刊，為世界各地中文寫作者提供寬廣而翠綠的園地。我也就是在這一塊塊園地上學着播種，並有所收穫。」

我國現代報紙副刊其實早就獨當一面，廣大作者與編者在此園地上勤耕不輟，為發展文化事業貢獻甚巨。

魯迅的名著《阿Q正傳》一九二一年起在北京《晨報》副刊上連載。金庸的首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一九五五年起在香港《新晚報》副刊上連載。巴金以「說真話」為主題的《隨想錄》，凡一百

五十篇文章，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六年連續發表於《大公報》「大公園」。先後在不同地方擔任《大公報》副刊主編的有多位著名作家：楊振聲、沈從文、蕭乾和楊剛等。

副刊常被譽為報紙的「文化副翼」和「靈魂之窗」，是文化傳播與知識普及的公眾平台，是連接作家、學者與廣大讀者的橋樑。

報紙的政治、經濟新聞偏向及時、新鮮、理性、客觀，副刊則通過散文、隨筆、詩歌、雜感等關注人們的日常生活、個體命運和情感體驗，賦予報紙一種溫馨而感人的人文氣息。

有人說：「讀者可能因一條重要新聞買一份報紙，但會因為一個喜愛的副刊專欄訂閱十年報紙。」

也有人說：「即使在數字時代，報紙副刊仍是最大眾化、最易獲取的文化與知識載體。」

不過，作為紐約的一個寫作者，目前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曾因副刊而格外受歡迎的紐約《僑報》，自多年前不知何故撤銷副刊以來一直沒有復刊消息。在紐約地區，以至在美國各地，中文寫作者並非寥寥無幾，而是比比皆是，人才濟濟，可如今不少寫作者和讀者卻只能望《僑報》興嘆，不知何時才能再見其副刊園地。胡適先生曾預言說，紐約可成為中國文學在大陸以外的「第三個中心」（另兩個是台北和香港）——這「第三個中心」難道就不需「文化副翼」和「靈魂之窗」而只需頭頂光禿的石獅和金牛嗎？

入鄉隨俗的「克拉克瓷」

藝象尼德蘭
王 加



藉着上月底「景德鎮手工瓷業遺產」被成功納入《世界遺產名錄》的「申遺」喜訊餘溫尚存，本周再深入聊幾句在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風靡一時、根據葡萄牙一款名為「克拉克」號的商船而誤打誤撞定名的明外銷瓷。

作為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的本土「特產」，靜物畫的細分類別「華麗靜物」（荷語Pronkstilleven）圖像中最具辨識度的象徵物件無疑是明代「克拉克瓷」（荷語Kraak Porselein）和華麗的鸚鵡螺杯。在馬德里提森博內米薩國家博物館（Museo Nacional Thyssen-Bornemisza）二層的長期陳列展廳中，有一面牆上並排懸掛着三幅由「荷蘭黃金時代」靜物畫家威廉·卡爾夫（Willem Kalf）所繪的「華麗靜物」。三幅畫中的靜物無一例外被安置在極暗的背景中，一束高光斜射落下點亮桌面上的物品。其中拋開各類金屬和玻璃器皿的材質反光，最耀眼的均是我國明代藍白相間的明外銷青花瓷，甚至連鑲金的鸚鵡螺杯都要作為陪襯。然而，在居中《有執壺和瓷盆、水果、鸚鵡螺杯和其他物品的靜物》中，我竟竟得了「克拉克瓷」入鄉隨俗的痕跡。

事實上，隨著過去三年在歐洲各大藝術

機構內欣賞了大量帶有「克拉克瓷」的靜物畫，我發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自我國明代（萬曆年間為主）景德鎮燒製的外銷瓷在經海運登陸歐洲後，從十七世紀初抵時由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克拉拉·皮特絲（Clara Peeters）等擅畫靜物的大師們精確描摹原汁原味的舶來品；到世紀中葉赫達（Willem Claesz Heda）和卡爾夫等人擅長的「華麗靜物」題材，畫中的「克拉克瓷」在器型細節上有了明顯變化。就比如，提森博物館所藏《有執壺和瓷盆、水果、鸚鵡螺杯和其他物品的靜物》中的焦點便是閃爍着金光的執壺和瓷盆。其中執壺的壺嘴、壺把和底座均鑲有金邊、瓶口更配上了金鑲鹿瓶蓋；而瓷盆的沿口和盆底也被鑲金包邊。上述細節卻從未出現在十七世紀初期靜物畫家筆下的明青花瓷中。由此可見，遠渡重洋的「克拉克瓷」在登陸不久後也經歷了歐洲上流社會的本土化改造。

那麼，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給「克拉克瓷」再加工的「後鑲金」步驟，究竟是為了華麗之名而「金鑲玉裹」？是歐洲皇室貴族的特殊審美喜好？還是客觀對瓷器的保護措施呢？「華麗靜物」題材中必備「克拉克瓷」，這類在當時被視為「白金」的舶來品



▲威廉·卡爾夫畫作《有執壺和瓷盆、水果、鸚鵡螺杯和其他物品的靜物》。

作者供圖

本身就象徵着奢華，有無器身鑲金包邊本無影響。但耀眼奪目的結合白潔亞光的瓷胎與清雅幽深的青花，如此材質的撞色不僅給予極強的視覺衝擊力，更順應了當時全歐巴洛克時期推崇金碧輝煌的奢華潮流。由此，對

瓷器增加金銀裝飾細節在迎合歐洲貴族時代審美的基礎上，還完美契合十七世紀尼德蘭貴族富商們力圖通過「華麗靜物」中珍稀材質堆疊的畫面來實現炫富需求的私心。

除了符合時代審美和滿足個人炫富，對「克拉克瓷」的後鑲金工藝實則還有實用性的考量。首先，西方的分餐制和我國飲食習慣截然不同，為了能符合歐洲人的餐飲習俗，金銀工匠們在十七世紀中葉開始在不損壞瓷體的基礎上進行「二次創作」，像卡爾夫畫中這類「給執壺加蓋，給瓷盆加把」的設計其本質上是為適應歐洲風土人情而做出的功能性改造。其次，東印度公司橫跨萬里的海運商貿，讓質地脆弱的明青花瓷有極大概率隨着運輸途中的撞擊磕碰而瓷體受損，器沿、瓶口和壺把等局部尤為脆弱。因此，工匠們對「克拉克瓷」的再加工，不單是對運抵時已破損商品的補救措施，更是減少這類當時如白金般貴重的舶來品在使用過程中可能受到損耗的未雨綢繆。瓶口、壺嘴、底座、壺把的鑲金既能保護瓷器最易受損的部分，還能滿足炫富的虛榮心，可謂一舉兩得。畫中「克拉克瓷」看似華麗的中西合璧奢侈品，實則是我國外銷瓷入鄉隨俗的必然產物。